

斯德哥爾摩大學的文革研討會

• 楊老玖 (Yang Lao-jiu)

1995年1月14-15日兩天，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亞太研究中心(CPAS, Center for Pacific Asia Studies)舉行了一次以「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原因及對社會的影響」(“Political Causes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為題的有關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國際研討會。這次會議是由該校漢學系副教授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籌劃的。他在介紹這次研討會時形容，「文革」原本是一場試圖把7億人民改造為無私、平等的碩彥之士，並防止資本主義發軔的大業，但這場由政治領導層挑起的危機帶來完全意料之外的後果。在「文革」中醒悟過來、元氣大傷的共產黨，自此決意投向資本主義的懷抱。會議第一天討論「文革」的起源，首位講者是哈佛大學歷史和政治系教授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他介紹了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第3卷的內容。麥克法夸爾說，毛澤東引蘇聯為

殷鑒，察覺到一種將會危及他自身和他對中國未來憧憬的歷史路向，但是他不肯承認他所說的，潛藏在中國人民身上、敢為革命獻身的精神已不復存在。假如中國人民真正被解放了，他們終會揚棄毛澤東思想而選擇「修正主義」。但中國人民要在經歷過十年動盪、毛澤東去世和鄧小平兩度復出後，才再次擁有這種機會。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牛大勇提交的論文題為〈冷戰與文化大革命的起源〉(“The Cold War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他指出，如果配合諸如美國政界的「和平演變」策略，和50年代毛澤東對蘇聯、波蘭和匈牙利所發生的事件的反應等相關因素，則毛澤東的「文革」理論可供研究之處甚多。

研討會第一天下午着重探討「文革」時期的工人角色。哈佛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魏昂德(Andrew G. Walder)發表了〈工廠中的中國文化大革命：黨政結構和衝突模式〉(“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Factories:

麥克法夸爾說，假如中國人民真正被解放了，他們終會揚棄毛澤東思想而選擇「修正主義」。但中國人民要在經歷過十年動盪、毛澤東去世和鄧小平兩度復出後，才再次擁有這種機會。

*本文題目原為：“Report on an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與會者楊老玖先生紀錄整理，經本刊翻譯發表。

Party State Structures and Patterns of Conflict”)，他指出了黨的網絡如何塑造工人的集體行動，把工人分成各個派系、造成派性鬥爭，因而在「文革」初期引發出無日無之的衝突。塑造工廠中的「文革」政治形態的，是黨基層網絡的崩析，和隨之而來為了建立形式相近的新網絡、不惜使用無情鎮壓和恐怖手段的黨一軍派系的猛烈攻擊。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政治系教授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和上海工運歷史學者李遜合著了一篇詳盡和精彩的論文〈各自為政：文化大革命中的上海工人〉(“Working at Cross-Purposes: Shanghai Labor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文章指出在「文革」展開之時，社會力量舉足輕重，但這些不同的社會力量卻各走各路。裴宜理說，光是上海工人就有三種不同的傾向：挑戰黨內當權派的造反派，力求自保的保守派和疾呼改善物質生活的經濟主義派。工人們各自為政，各派工人懷着迥然相異的動機，分別主張造反、保守和經濟主義。

研討會的第二天，首先由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講師印紅標發表有關紅衛兵運動的主要傾向的論文。他指出，歷時兩年多的紅衛兵運動的性質並非單一，而是包括了許多互相矛盾、互相衝突的思想傾向和政治派系。若想確切了解「文革」中大規模群眾運動的歷史發展和社會基礎，則先要研究那些主要的紅衛兵思想傾向和派系的行為，並分析導致紅衛兵運動出現和影響其歷史進程的政治社會因素。德國亞洲事務研究所研究員海爾曼(Sebastian Heilmann)的論文題目是〈背棄「文革」：70年代中期的派系分裂、群眾示威和動員能力喪失〉

(“Turning Away fr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Factionalism, Grass-Roots Protest and Demobilization in the Mid-Seventies”)。文章指出，經過了「文革」激烈時期(1966-1968)的暴力失控和大規模政治迫害(1968-1972)之後，中國城市社會經歷了一次嚴重的危機，而黨內各階層的政治鬥爭則使情況愈趨惡化。黨組織的分裂縱容、甚至促使了有限度的自發和偶爾公然偏離官方路線的政治激進主義的出現。在70年代，社會上大多數人不只背棄了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目標和步驟，也背棄了官方的「群眾路線」。至毛澤東去世時，中國共產黨的「運動政權」已喪失了大部分的政治效能。

1月15日下午，沈邁克發表了這次研討會的最後一篇論文。主題是「中央專案審查小組」和它在化解1966-1979年間的精英衝突所扮演的角色。沈邁克認為，「中央專案審查小組」是中國共產黨一個極為重要、但未被深入研究的環節。十多年間，這個組織享有的權力甚至比前蘇聯的肅反委員會(Cheka)還大，但西方學者的著作卻鮮有提及。文中羅列此小組的內部結構、它與其他黨政軍組織的關係、它的人事變動和日常運作程序等資料。介紹過這些資料後，文章進一步分析了這小組的存在和運作如何影響並塑造文化大革命的進程。最後試圖闡明，若要對「文革」所發生的事情作一實際、符合歷史和令人信服論述，則對於像「中央專案審查小組」這類關鍵機構的深入研究是不可或缺的。

裴宜理和李遜指出文革中各種社會力量舉足輕重。上海工人就有造反派、保守派和經濟主義派。工人們各自為政，各懷着迥然相異的動機。

林立偉 譯